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 徐现祥 刘毓芸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自1950年至今,至少49个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经济体一直或曾经定期公布经济增长目标,比如中国、印度、欧盟各国等。

就这49个经济体的实践而言,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呈现以下三个典型事实。一是经济体宣布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明确了相应的资源配置。比如印度每次给出经济增长目标后,都详细说明政府将如何配置资金,并给出有关资金使用的具体项目、行业等。二是宣布的经济增长目标与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经济增长目标变动1个百分点时,随后的相对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变动大约1个百分点。三是各经济体开始实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时间并不一致,实施一段时间后,一些经济体放弃了,一些经济体还在实施。2000年3月欧盟通过第一个十年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欧盟在2000—201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3%;欧盟委员会2010年3月公布的第二个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则没有再预设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至今仍然实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比如中国和印度,尽管都曾暂停过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但是至今还在实施。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把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定义为:政策当局宣布一个某时间内的增长目标并相应配置资源的行为。

至少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经济增长文献忽视了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现象。经济增长文献一直在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20世纪50—60年代强调资本积累和外生的技术进步;80年代则强调内生的技术进步及其影响技术进步的政策等;21世纪初定量分析制度因素的影响,强调内生制度是深层次决定因素(Hall & Jones, 1999; Acemoglu et al., 2001)。这些文献都是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鲜有明

确涉及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现象。当然,这可能也意味着,在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根本不存在实行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可能性,需要放松某些假定条件,才可以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基于此,本文尝试放松某些假定条件,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现象。内生经济增长文献通常把生产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最终产品的生产、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以及新技术的研发,进而假定,一旦研发出新技术,中间投入品厂商就可以直接采用该新技术投资生产新的中间投入品,最终产品厂商则采用新中间投入品等生产最终产品。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对企业生产活动的描述隐含地假定,在生产各个阶段或环节,企业自主投产,无须政府审批,无须支付市场进入成本。但从现实看,即使到了2015年,就全球190个经济体而言,企业进入市场需要最少1个政府审批程序,最多20个,平均是7个;付出的费用最低是0,最高是人均GDP的3.3倍,平均是人均GDP的26.8%;所需的时间最短是0.5天,最长是186天,平均是26天。基于此,本文假定政府审批企业投资,把一个由中央和部委官员构成的政府嵌入标准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中央任命部委官员,其最大化目标为经济体实际增长速度;部委官员负责审批投资,其最大化目标为审批权力租金。因此,中央为了激励部委官员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设置增长目标并以此考核部委官员;部委官员对增长目标做出反应,选择相应的审批通过率,从而影响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经济活动。

本文把这个想法模型化,证明了当政府部门间目标不一致时,增长目标管理是一种解决办法,将倒逼部委官员提高审批通过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而言,中央设定与部委官员利益相兼容的增长目标并以此考察部委官员,与没有增长目标的情形相比,提高了部委官员积极性,从而提高投资审批通过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无法实现其在无审批情形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在审批

经济体里,政策当局进行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可行的,但并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进行行政审批改革、放松市场进入管制才是根本之道。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手工收集了 49 个经济体在 1950—2020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我们主要通过访问其官网的方式收集了除了非洲和南美洲以外全球各个经济体 1950 年以来制定、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结果发现这 49 个经济体制定并公布了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这 49 个经济体都位于亚洲和欧洲,在 2014 年,占全球总人口的 64.8%、全球 GDP 的 58.8%。整体而言,在 2014 年,这 49 个经济体实际人均 GDP 的均值比全球的略大些,标准差比全球的略小些。这似乎意味着,本文所采用的这 49 个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

这 49 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不是一个平衡面板数据。这主要是因为,各个经济体开始实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时间不一致,最早是 1951 年、最晚是 2014 年;最近一期经济增长目标终结的时间也不一致,最早是 1985 年、最晚是 2020 年;实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时间跨度从 4 年到 66 年不等,而且每期经济增长目标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基于此,本文把这个非平衡面板数据转换为截面数据,采用经济体实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的平均经济增长目标度量其增长目标。

经济变量数据来自 PWT 9.0。为了可比起见,各个经济体的实际增长速度都来自 PWT 9.0,并按照各个经济体实施增长目标管理的时间跨度分别计算其相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和美国的平均增长速度,最终得到各个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的相对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而言,增长目标越高,其随后的相对经济增长速度越快。

三、实证结果

与理论预期的一致,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其随后的经济增长。回归方程的拟合度为 0.44。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这个变量大致可以解释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 44%。就本文所关心的回归系数而言,为 0.89,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无法拒绝其等于 1 的零假设。这说明,与理论预期的一致,平均而言,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增长弹性为 1,即增长目标每变动 1 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将变动 1 个百分点。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本文所采用的样本可以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欧洲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OECD 经济体和非 OECD 经济体;OPEC 经济体和非

OPEC 经济体;1990 年后终止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引入这四类虚拟变量后,回归方程的拟合度从 0.44 提高到 0.51,本文所关心的回归系数略微提到 0.91,显著水平则没有发生变化,无法拒绝其等于 1 的零假设。这表明,控制了经济体类型后,经济增长目标依然对随后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采用各个经济体实施经济增长目标时的人均实际 GDP 占美国同期人均实际 GDP 的比重,度量初始发展水平,原始数据来自 PWT9.0。从回归结果看,初始水平的回归为 0.012,不显著。这时,本文所关心的回归系数为 1.024,无法拒绝其等于 1 的零假设。这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的弹性是单位弹性。

本文分别引入以下四类控制变量,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一类是地理变量。Diamond (1997) 强调,地理环境影响了各经济体在新石器时代从狩猎向农耕的转变,从而对其随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持久影响。经过 Gallup 等 (1999) 以及 Olsson 和 Hibbs (2005) 等的实证工作,地理变量现已几乎成为跨国实证分析中的必备控制变量。第二类是文化变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韦伯 (1987)。Barro 和 McCleary (2006) 实证分析发现,宗教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Easterly 和 Levine (1997) 以及 Alesina 和 Devleeschauwer (2003) 跨国实证工作也发现,包括种族、宗教、语言在内的分化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第三类是制度变量。North 和 Thomas (1973) 强调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源, Hall 和 Jones (1999)、La Porta 等 (2008) 以及 Acemoglu 等 (2001) 的实证工作验证了这一点。第四类是人类基因变量。最近的文献强调,由于人类自身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代际传递,一些历史因素对当今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长期影响 (Spolaroe & Wacziarg, 2009; Putterman & Weil, 2010; Ashraf & Galor, 2013)。

以上回归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的一致,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增长弹性约为 1。这个发现是相当稳健的,当进一步控制了数据测量误差、地理、文化、制度、基因等变量后,本文的发现依然显著存在。

本文的工作还是初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收集整理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还存在部分缺失,还没有办法考察为什么有些经济体选择了增长目标管理,而有些经济体却没有;没有考察经济体退出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情况;也没有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的短期变动情况。另外,本文也没有实证考察增长目标管理中的权力租金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 《经济研究》2017 年第 7 期,约 21000 字